

與文化處境配合的宗教中國化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還在二〇一四年時候，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張志剛在一學術會議中與我商談，希望建立一研究項目，重點是「基督教中國化」。同時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亦參與合作，他多年研究這課題，希望基督教能生根中國，成為中國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。這也是我數十年研究的方向，因我是精研中國哲學，也依中國聖人之學修養的學者，同時信仰基督教，研讀神學及靈修之道，多年來反思建立中華神學之路，探討基督教如何在保持聖經信仰及基要教義的核心下，與中國文化會通共融。學者們的努力是希望基督教文化能生根中國，而不再被視為外國滲透，或外國侵略的洋教。這項目成立後，開了幾個研討會，出版了一學刊及十多本學術性書籍。

沒想到政府後來在宗教政策上提出了「宗教中國化」的方向。十九大報告指出宗教方針是：「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，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」。宗教中國化，是指宗教不只是追尋高超的境界，且可在中華大地上發揮積極的作用，在當前中國文化與社會中作貢獻。劉金光博士提出，「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浸潤各個宗教，而且要求各個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、禮儀、教規、教義不變的同時，挖掘各種宗教中包括友善、慈愛、和平、向上、向善等內容」。

從目前處境瞭解，中國發展至今，已成功建立了城市經濟體，中產階層已形成，初步完成了現代化，這是歷史空前的成就。但同時現代化社會的問題也跟著來臨，農村的血緣家族連繫漸解體，城市化形成小單位的家庭，親情繫帶漸薄弱，在繁忙工作及多元接觸的城市生活中，人有很多情慾的引誘，引致婚姻家庭基礎不穩固，帶來很多痛苦。對家庭中受傷的成人或孩子，極需要有關愛、輔導和心靈的醫治，更重要是建造新時代的道德倫理，這些正是宗教群體可以做的。

另一面社會在發展中產生貧富差距，弱勢階層在教育與醫療上資源不足，因此政府通過城鎮化及精準扶貧等，大力改善貧困處境，我親眼見到甚有成效。但弱勢者潛伏很多心靈上的不穩定性，一是在現實上仍會感到不安全，也有在城鎮改革時，因各種拆遷事件而感到權利不被尊重等。我的機構有十六年在農村與城市農民工中工作，接觸很多留守、流動兒童及其家庭，明白弱勢者不單需要金錢與物質，更需要精神上建立盼望與方向，也需要被尊重和愛護，這些精神上的支援，正是宗教群體可提供的。

我多年與政府不同部門及智庫學者交流，知道政府對中國現實上各種社會問題都一清二楚，也探討宗教對社會新發展如何有貢獻。十年來政府每年主辦與香港宗教團體及教會領袖對話，瞭解宗教如何供獻社會公益與服務。調研多年，國家提出宗教中國化，是考慮宗教徒是中國一個龐大的群體，政府要保障其信仰自由的同時，也希望各教在不改變其核心教義下，發揮其仁愛精神，對中國當前處境作貢獻，使宗教與社會發展相適應，共同達到民族文化重振之目的。

卓新平教授是人大常委委員，在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《中國民族報·宗教週刊》訪問中說：「我們也理應將中國的宗教視為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一種正常方式，視為中國人精神生活有機而

鮮明的構成之一」，「讓宗教『脫敏』，不再把宗教視為中國社會的『另類』，應該是我們當前中華文化重建中的重要思路之一」。這也是一個對宗教大方向的思路。

我考究政府這思路，是尋求各宗教與政府共通點，就是從務實的方向，鼓勵宗教對社會公益作出貢獻，也繼承中華文化的精神，而不管宗教的信仰內容，也不要求宗教改變其核心信仰。宗教教義各有不同，但都重視仁愛關懷的行動，這可安慰並化解人心在社會發展中遭遇到的苦楚，這就是宗教可作的貢獻。

至於基督教中國化，從信仰本身去瞭解，是指基督教生根於中國之道，能用中國文化的思維和理念去表達信仰的核心，信徒的見證能使中國人的心靈明白。這是信仰落入處境中的發展，並無改變聖經真理，反可幫助多人認識信仰。其實基督教中國化在歷史上基督教進入中國時開始，將聖經翻譯成中文，宣教士中一些有識之士從一開始就用中國的方法和文化進行傳揚，用中國人理解的方式帶入基督信仰的啟示與救贖，就是中國化的表達。第二、三世紀基督教的教父，都善用希臘哲學去解釋聖經，也因此發展了神學，使信仰生根在西方。

當然真理自身是普世自存，沒什麼中國或西方的，但表達和實行真理，就須與文化處境配合。從利瑪竇到馬理遜，他們都熟讀中國文化的深度價值內涵，宣教士一開始就用了中國化的方法，讓中國人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教義。過去宣教士有三層次表達信仰：

1.利瑪竇熟讀中國古經書，懂書法，穿儒服，通過中國文化哲理介紹基督信仰，融會中國古文化表達聖經，與知識份子及士大夫交往，使不少有學識者知道信仰與中國文化融會，但又明白純正基督信仰的真理觀的獨特性，而學者領袖如徐光啟及李之藻等接受基督，同時又承擔中國文化價值及民族使命，這是文化上的中國化。

2.李提摩太知道基督教只要來到中國，就必須與中國的社會需要和文化現狀相配合，由關注中華民族前途見證基督，提倡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教育等體制改革，得改革派官員及皇帝接受，差點戊戌維新改革成功。其間他作為信徒及教士身份貢獻中國，很受尊重。這是社會改革上的中國化。

3.戴德生深入中國草根階層，關懷和愛每一個個人。據他日記記錄，早期來中國時，在街上見每一個人，都關心其靈魂，愛這個人。他要求宣教士徹底放下，過貧窮的生活，也穿華人服務，拖一辮子，認同普通中國人民。在發生教案時，反對西方派兵去欺負無辜的中國人民。在鴉片猖獗時期，開戒煙診所，到一九〇五年增至一百零一間，在一九〇〇年已幫助了三十四萬人戒除煙癮。同期宣教士如德貞(H.J. Beattie)一八七六年回英建立反鴉片會成立，譴責英國販賣鴉片，發動全英國有良知的人簽名反鴉片，一九〇六年英國國會終通過「鴉片貿易違反道德」，迫英政府停止賣鴉片。這是在社會與人民關懷上的中國化。

從歷史到今日，中國基督教由景教在唐貞觀九年(六三五年)入華，已一千四百多年，基督教都在努力中國化的過程。此中的關鍵，是不能將信仰的普世真理觀失去，也不要變為政治化的宗教。中國的三自教會已開全國會議，一致堅持跟從聖經真理，及基督教普世核心教義，不會違背大公會議信條(即使徒信經與尼吉亞信經)。依這前提來探討基督教中國化，與中國社會及文化發展配合。基督教中國化不會妥協聖經真理與核心信仰，同時充分以愛心進入中國處境，用中國人的思想與文化特質瞭解信仰，現實上參與解決中國當前發展的問題，支持改革，建立社會和諧，醫治心靈創傷，教育扶貧等。信仰的普世價值即可生根在具體中國文化與平民心中，成為中國基督教，開花結果。